

鄭永年：如何看待全球疫情蔓延和巨大衝擊？

俠客島

新冠疫情在全球的急速蔓延，超出很多人的想像。隨著確診病例、死亡人數的攀升，疫情會對全球政治、經濟、社會產生多大多久的影響，是縈繞在許多人心頭的疑問。就此，我們與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鄭永年教授進行了一番長談。

1、俠客島：新冠疫情爆發到現在已經幾個月。您對各國應對疫情有何整體觀察和評價？如何看待不同國家在疫情防控上舉措與效果的差異？

鄭永年：總體來看，西方國家應對疫情的表現令人失望。西方擁有最發達的經濟體系、公共衛生體系和龐大的中產階級，所有條件都很優越，為什麼還是失控狀態？如果要我來打分，滿分十分，西方國家五分都不到，最多拿四分。

現在西方一些人怪中國，這沒道理。要知道，新冠肺炎病毒是人類此前未曾見過的，抗擊疫情是全新的挑戰。中國迅速行動起來並獲得成效，實屬不易。相較之下，歐美說不過去。他們有足夠時間，為什麼沒準備好呢？

比較來看，東亞國家和地區防控做得比較好，至少有幾方面的原因。

第一，體制動員力。從東亞戰後的發展史來看，包括日本、四小龍、中國在內，多數屬於“發展型政府”，政府比西方強勢；西方是資本主導的秩序，美國現在還在討論，甚至說“犧牲生命也要維持經濟運作”，“保經濟更重要”。

第二，老百姓對政府的信任度更高。東亞社會的民眾普遍更守紀律。政府要求居家隔離、不要恐慌、不要搶購、按時量體溫，絕大多數民眾都能做到。對東亞社會來說，“生命安全”和“自由”不需要比較——命都沒了，還有什麼自由呢？西方則不同，現在還爭論“權威主義”，認為政府權威過大，就沒有自由了。至於“群體免疫”這話，放在東亞不可想像，會使政府丟掉合法性。

在這個意義上，東西方都有“契約”，但是形式不同。西方的契約是選票，選上就可以。但問題是，政治是治理，不是選出來就高枕無憂了。天天指責別人、或者提前佈局拋售股票，這樣的政治人物不會取得什麼實際治理效能。

但疫情防控也不只跟體制相關。說到底，西方國家應對疫情不力，是資本和社會失衡的結果。

他們確實有最發達經濟體、最發達的公共衛生體制，但口罩、防護服、洗手液等基本醫療衛生物資都不能生產。不是沒有這個技術，而是生產能力流到其他國家了。

反過來也一樣。中國抗疫能有今天的成效，除了有效動員、一線醫務人員捨生忘死付出，還要歸功於物資生產能力。中國最值得重視的抗疫經驗，是“制度資源”和“經濟資源”配合、統一，西方的制度和經濟資源則產生了錯位。

中日韓三國在抗疫初期合作很好，跟產業鏈密切配合有關係；歐盟沒有產業鏈，就合作不好，所以很狼狽。美國也是。

2、俠客島：不少機構及學者都在討論疫情對世界經濟帶來的衝擊。有分析說會造成全球性衰退，有人拿疫情與 2008 年國際金融危機相比，甚至與當年的“大蕭條”相比。您怎麼看？

鄭永年：全球化條件下就是這樣，第一季度中國幾乎停擺，好不容易慢慢恢復，訂單卻大幅減少了。所以有人說，只要世界不變好，中國也會很難。這有道理。

但要思考的是，疫情衝擊之下，還有“世界經濟”嗎？新加坡 147 架飛機，現在只有 9 架在飛；旅遊、餐飲等服務業更不必說；製造業也沒有需求。因此疫情之後，肯定會有很多反思，尤其是一個問題：全球化到底為了什麼？

在我看來，經濟全球化還會繼續，但不會是上世紀 80 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主導的全球化。每個國家都會把事關國家安全和民眾生命安全的生產能力留在國內。

上一波經濟全球化，很多國家失去了“經濟主權”，稅收、就業等都轉移出去了，國內產生了很多矛盾，社會差距拉大，中產階級規模越來越小，這都是現在西方民粹、保護主義的產生根源。所以，未來的“全球化”概念可能會發生變化。

疫情對世界經濟的衝擊可能超過“大蕭條”。當年大蕭條幾乎只影響西方國家，但現在主要經濟體都受到影響。大蕭條時各國同意用凱恩斯主義解決問題，但現在呢？一些國家便開始印錢、寬鬆，只顧解決自己的問題。

更大的問題在於：如何控制社會恐慌？在中國這個問題幾乎不存在，黨的系統、行政系統就夠了；但很多國家都已經出動了軍隊來維持社會秩序。

歷史上，瘟疫和戰爭幾乎是孿生兄弟，如果社會恐慌控制不住，民主政府和法西斯政府幾乎只有一牆之隔。必須看到，這次是“綜合性危機”，是經濟危機、社會恐慌、國家治理危機的“三合一”併發症，在西方尤其明顯，要非常警惕。

3、俠客島：國內公眾比較氣憤的是，在中國抗疫吃緊的階段，西方輿論冷嘲熱諷；西方疫情蔓延，一些政客甩鍋、指責中國，大搞汙名化；中國支援國際抗疫，西方又說這是“外交攻勢”“掠奪式捐助”。您如何看待這些政治操作和輿論聲音？

鄭永年：確實要看到深刻危機。疫情引起的海外的、我稱之為“反華為核心的民族主義浪潮”已經浮現。一方面，這是政客無能、推卸責任的做法，但更重要的是背後隱藏著“議程設置”。

二戰前法西斯的崛起，是用右派民粹主義反對他們所謂的左派民粹主義（共產主義、馬克思主義等），這個大的局面到今天沒有變化。西方民間的反華事例這次能看到很多，Anti-Chinese，華人、華人企業已經感到壓力，留學生、出去的學者也是；精英階層則非常意識形態化。

疫情受控以後還會有這樣的浪潮。按說，世衛組織定義了病毒名稱之後就應該按世衛組織的定義來，但是蓬佩奧、美國的反華議員到現在還在講“中國病毒”，這是故意的，遠超出“推卸責任”的範疇。

反過來，中國在行動上、動員上做得很好，反而被說得很差。西方一直有偏見，他們說援助是稱霸，應該怎麼回應？我們現在還是習慣“國際合作”“大國責任”的說法，這種說法多少西方民眾真正理解？這是很精英的話題，但精英階層非常意識形態化。

在我看來，不如回歸最基礎的，就是人道主義。這本身就是戰後國際秩序的起點。疫情導致多少人感染和死亡？死亡是全世界的公敵，沒有人能置身事外，這就是弘揚人道主義最好的場合。

中國領導人說，老百姓的生命安全是第一位。難道我們不知道封城、封省、停擺會造成多大的經濟損失？為了老百姓的生命安全，就這麼做了。這是地地道道的人道主義。這個文章做好了，軟力量就有了。

至於病毒起源于哪里，科學家都不知道，政治人物怎麼知道？一句話就對回去了。中國政府現在對 120 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提供了援助，這還不包括各地政府和中國企業的捐助、援助行動。人道主義、救死扶傷就是最好的話語，也是最通用的可以接受的話語。

4、俠客島：回到中國。疫情已經對中國的經濟、企業和人造成衝擊，習近平總書記在浙江考察時也提到，“危和機總是同生並存的，克服了危即是機”。國內疫情逐步穩定之後，下一步您覺得可以如何佈局？

鄭永年：要提前思考未來經濟佈局。

前面提到，疫情之後會是新的全球化階段，各國都會強化自己的“主權經濟體”，恐怕要回到 80 年代以前“有限全球化”的階段。並不是說什麼東西都要自己生產，但大多數東西還是要自己生產，靠內需，要在自己的產業鏈上向上爬升，提高技術含量。

我看到國內有些地方又在用老思路搞傳統基建項目。問題是，同樣的財政支出，是不是可以向社會公共事業多做投資？比如農田水利、醫療衛生，這都是內需、剛需。舊的思路主導下，總以為等著，國際經濟就會好起來。但我認為這次疫情是改變世界歷史進程的大事情。美歐都會一定程度地恢復“自食其力”。

因此，要有新的“主權經濟觀”和國際經濟觀，才能知道下一步我們的經濟該如何佈局。要考慮“需要一個怎樣的內需社會”。要救企業、救老百姓，也要

把我們自己的中等收入人群規模做大。大規模基建可以解決一定的就業，但不是什麼時候都有效。

我們也看到，社會力量在疫情防控中發揮了非常好的作用。企業家捐款、志願者做事、企業和政府合作，發揮了很好的作用。按理說，西方是小政府大社會，但是他們的民間力量發揮了這麼大的作用嗎？所以，如果在中國的制度設計中給社會力量更大空間，政府的負擔會大大減輕，社會力量發揮的作用也不會比西方差。